

一场从古至今的中国译论旅行

——读《中国译学史》有感

陈源彦,李 萍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中国译学史》是鲜有的译学理论史学著作。作者陈富康将中国翻译史分为古代、晚清、民国和新中国建国后四个时期进行叙述,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遴选当时有代表性的翻译家进行介绍和评述,为读者勾勒出中国译学进程史的大致轮廓,同时,注重对各时期各翻译家其译论之间的关联进行介绍,“尽量显示史的连贯与动态发展”,如实讲述,客观评论。《中国译学史》一书中收录的译论和作者对观点的评述都为读者提供了诸多具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建议,以探译海之深浅。这些理论和经验对于从事翻译方向的研究者开展翻译理论与实践活动具有指导性的作用。

关键词:译论;译学史;翻译家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4)04-0136-03

《中国译学史》是鲜有的译学理论史学著作。作者陈富康将中国翻译史分为古代、晚清、民国和新中国建国后四个时期进行叙述。作者在引言中讲到:“译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受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辩证规律的支配”^[1];翻译实践的发展促进了翻译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译论的深浅兴衰,取决于翻译实践对它的需要程度”,先简述历史背景,后分析在该历史背景下翻译的特色、侧重领域,以及各名家提出的具有该历史时期特点的翻译理论,从而实现中国翻译学与中国历史的衔接。

1 中国古代的译论

先秦时期,“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翻译有了现实的需要,但“人们最初的翻译活动是口头进行”,也就鲜有记载成文的翻译理论。另外我认为,先秦译论少的另一个原因是受孔子的影响,孔子持“翻译为小辩的轻视态度”,或多或少地影响其他学识人士不去研究译论。

古代译论的贡献主要来自于佛经翻译。代表人物有支谦、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玄奘等。

作者说道,早期的“译经史存在文、质两派”,这算是中国翻译史上直译意译的对峙开端了吧。而支谦在翻译佛经过程中,提出“循本旨”、“不加文饰”、“勿失阙义”等观点,算是早期的直译说。道安在由胡译秦的佛经序文的翻译上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用现代语概括来

说,就是反对颠倒原本词序,反对添词润文,反对删繁从简,并认为这些译法不忠于原文。道安从宗教虔诚的角度出发,强调忠于原文,唯恐失实,因此他在其译论中“坚决反对削胡适秦,饰文灭质,求巧而失旨”。道安的第一条是不现实的,只忠原文,不忠读者,不考虑汉语词序的译本想必十分难懂。尽管如此,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对后世的翻译实践有重要影响。

与直译派道安不同,鸠摩罗什倾向于意译。他往往不遵循原文的行文体制,而是采用经常变译的方法来译佛经。安不通原语,翻译往往谨词慎字,唯恐疏漏了任何一字,而什精通双语,在原语与目的语之间才能“游刃有余”地放开胆子翻译,在通晓原本的基础上“或增或削,务在达旨”。

而后的慧远在对道安和鸠摩罗什各自译论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阙中之论。他批评了僵硬的直译派和盲目的意译派,强调佛经翻译的文和质,“两种译法都要掌握一定尺寸”。他的译论给古代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暂时画上了一个停歇符。

古代佛经译史中要提及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玄奘,他在直译和意译上取得了圆满调和。玄奘提出了五不翻,即音译,并对翻译工作进行了科学分工,包括译主、证文、润文等,力求译文的准确、纯在和流畅。这是非常值得后人借鉴的。

第二次翻译高潮由欧洲传教士来华推动,这时西方的科学文化随着宗教一起进入中国,中国在自然科学类著作的翻译史由此开始^[2]。由于中西方文化及思想的巨大差异,翻译的信达问题成为了这一阶段译论的中心。最开始,翻译家们讲究达意,“俗而雅、浅而显”即为好的译书。其后随着译事经验的丰富,译者进而要求“兼通雅俗”,并开始注重应用中国的“俗语常言”,追求地道的译本。在这一翻译高潮中,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在西方科技类著作的翻译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并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当时的翻译功用是向西方学习科技知识,因此翻译思想的特点成为求知、求真理、抓急需和“裨益民用”,为了中国的兴盛,强调了翻译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 晚清时代的译论

清王朝闭关自守的政策在帝国主义的枪炮下化为一纸灰烬,西方的文化思潮大量涌入中国^[3]。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爱国人士一方面为了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技术,一方面为了保国和民族振兴,将翻译的目的落在“制敌”上。“师夷长技以制夷”,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出发,着重翻译科技类和地理类的书籍,而对宗教类的书籍则不那么关注了。在这一背景下,有关科技类著作的译论也丰富起来,这推动了中国翻译史的发展。

傅兰雅系统地阐述了前人的译学主张,认为科技类书籍的汉译并不难,指出中国“也可创造科技词汇”,这极大增强了国人译书的信心,“倡导统一科技译名,制订了译名的具体规则”,当时统一的许多译名沿袭至今,“论述了翻译科技书的选择方法,以及中西译者如何配合”,为符合现实的需要,“他强调原书要考虑新、紧用”。

维新派人士马建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林纾都为翻译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马建忠将反抗外国欺侮作为译书的首要目的,提议创办专门的“翻译书院”,并提出了“善译”的标准,在意义上完全忠于原文,并使读者能拥有“与读原文相同的感受”,这种观点类似于现代的目的对等理论。翻译发展的领域方向是顺应历史潮流和现实需要而变化的。在有名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也提出了培养翻译人才的想法,侧重领域也转移到政治、法律及各种学术书籍。梁启超指出“应尽量挑选国外最新出版的原著”进行科技、制造类书籍的翻译,另外统一译名、培养通双语、晓译论的翻译人才,成了译书的“首立三义”。

严复为中国的译论作出了杰出建树,最有名的就是他的“信达雅”理论。“信达而外,求其尔雅”,由于后人对信与达都没有什么疑义,在雅方面作者做出了一番评述,雅这个标准是有必要的,但针对不同类的翻译作品雅的要求不一样,“文学类的要求最高,哲学社科类的低一些,科技、公文类的更低一些了”,另外,“有些文学作品中有一些粗鄙、错乱甚至污秽的文句,是内容的需要,这些‘丑’的描写正是为了塑造作品的‘美’,这是艺术辩证

法”。用这三个字来指导翻译是有普遍意义的,与其他维新人士一样,严复同样将翻译的目的放在救国上。

林纾作为我国近代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大量翻译了西方的文学小说。他“广译东西之书”,渴望通过小说“启发民智”,将帝国主义的阴谋告于天下,也是出于救国之需。他强调译者应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与原作中的人物进行心灵交流。在翻译方法上,他指出尽管外文某些内容我们不赞同,但在翻译中还是应该忠于原文,要“存其文而不踵其事”,这也是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的。

章士钊就音译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论点:“译音只可用于地名人名及新发明之物名,因无意义可求也。其他有意义之名词,仍以译义为宜”,音义两译各有理,译者应根据现实需要自行取舍,论述也就全面、科学了。关于译名,章运用了符号学进行了探讨,指出文字只是思想的符号,只是表象,“常有变迁”,这一论点颇为科学。

3 民国时期的译论

随着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译者们大量翻译引进外文书籍,翻译事业的重要性自然不必多说。郑振铎针对“文学书是否能译”探讨了翻译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文学书绝对能译,他指出,“思想完全能译,艺术的美充分能译”,“文学上的风格是表达的代名词,文学中的表达是将思想翻译成文字;由于人类的思想具有共通性,因而风格是可以在各种语言中移转的”。朱自清就译诗谈到,诗歌的可译性和价值关键要看译成的语言是否能够增加意境,带来“新的语感、新的诗体、新的句式、新的隐喻”。闻一多提出“以诗译诗”,只要“意旨未失”,译者“可以多点自由权”。成仿吾认为,“理想的译诗,首先应是诗,应传达原诗的情绪、内容,取原诗的形式”。

这一时期中,鲁迅为译学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首先,他讨论了翻译的目的和宗旨。当时他的翻译书籍文章多为科学的文艺理论和革命的文学作品,作为读者言行的指南针。并且,他还赞成翻译各种作品,无论是来自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做到“知己知彼”,尽量多多了解外国的精神生活,避免“变成精神上的聋和哑”。鲁迅的直译观对中国译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发了许多争论。作者对其直译观作了全面客观地论述,而鲁迅自己对过度重视直译会产生的死译以及自己因能力不足而致使其译文中的生硬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抛砖引玉,欢迎更好的译文替代之,这种观点其实是很科学的。鲁迅的“直译”是针对当时部分译者为“炫学”而采用的“歪译”而言,是包括“意译”在内的一种“正译”。当然,鲁迅还圈定了直译针对的原文类别,即理论性书籍。当时还存在一种“顺译”观点和“第一要件为达”的倾向,鲁迅指出,“信而不顺”至多让读者一开始有些看不懂,揣摩一番也许能懂,这是句法结构的问题,而“顺而不信”却可能产生误导,这是文义出现偏差造成的,读者无论如何也看不懂了,尤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在政治类译本中所谓的

“顺译”很可能会犯政治性错误。另外,鲁迅还就翻译的言语和句法进行了探讨。历史是发展的,文字应该也是发展变化的。通过翻译来为中文增添新的词语和句法是必然的。虽然刚开始读者会不甚习惯,但这样可以丰富国语,“尽量输入”,“尽量吸收”,“可用的就传下去了”。读民国的旧白话书籍,里面的许多句法令人费解,正是有了这些引入的新句法才为白话文注入了活力,发展为今天方便的白话。关于译论上的“归化”和“异化”(鲁迅称“欧化”),鲁迅认为必须保留原文的洋气,作翻译时力求译作内容易懂,同时还应保存原作的“丰姿”。关于重译(转译),鲁迅认为译者应该同时通晓目的语和源语,从而从原著直接翻译,但局限于当时的客观因素,精通欧语的译者少,从日译本来引入欧洲的著作的重译仍有必要,而重译的优劣应该由译本的质量决定。关于复译,鲁迅认为这不仅可以打击现下不负责的乱译,同时能将中国文学带入一个新阶段。事实也证明如此。鲁迅十分重视翻译批评建设,并虚心接受他人对自己译作的批评。他鼓励好的译作,指出坏的译作,以及坏译作中较好的部分,但没有提及对坏译作进行修改或给出明确建议。

此外,朱文振还提到了一般人所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在翻译中标点符号的处理,译者应“适应环境”,不能盲目照搬标点符号。

4 新中国成立后的译论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译论的发展也成为学术焦点之一。这时译界的关注点在于追求更高质量的译本,因此译者对于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的重视度与日俱增^[4]。董秋斯开始强调译论建设的重要性,大力倡导开展翻译批评,建设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为翻译批评确定标准、提供依据。他呼吁译者们不仅要进行中肯的批评,还应就坏译提出适当的解决办法,从实际上推进翻译工作。矛盾的报告为建国后的文学翻译提出了重量级的见解。几位国家领导人就翻译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足以

证明翻译事业对中国建设发展的重要性。傅雷说,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要“重神似不重形似”,传神达意远比按照原文词法句法拼凑要重要得多,但同时他也表示并非不管原文的句法,但对原文句法的保留的前提是要确保译文“不失为中文”。

这一阶段的译论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大多数译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注意用哲学的方法论来进行翻译分析。二是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经验和理论得到总结和发扬。这是具有明显时代特色的。

到了后期,对于美学的研究开始引入翻译研究中,从更高的层次追求“局部美和整体美的统一,形似和神似的统一,文字美和音韵美的统一”^[5]。其后中国的四化建设加大了对科技翻译理论探讨的重视程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口译、同声传译、机器翻译相关的译论也进入译界的研究日程。译学界正式提出建立“翻译学”这一科学专题。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对中国译学史进行了梳理,广泛介绍了中国名译家及其译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客观评述。这些理论和经验对于从事翻译方向的研究者开展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具有指导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陈福康. 中国译学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2] 官 琴.《中国译学理论史稿》述评[J]. 中国文学, 2011(8):12-17.
- [3] 赵秀明. 翻译理论现状与发展的思考[J]. 中国翻译, 1996(3):67-72.
- [4] 罗 峰. 从翻译学学科建设看翻译学在中国的发展[J]. 琼州学院学报,2010(4):30-38.
- [5] 陶丽霞. 文化观与翻译观[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07.

(责任校对 王小飞)